

目 录

孙中山	尚明轩 (5)
黄 兴	周天度 (35)
宋教仁	周天度 (43)
陈天华	周天度 (48)
秋 瑾	闻少华 (52)
徐锡麟	闻少华 (58)
朱执信	尚明轩 (62)
熊成基	黄德昭 (68)
焦达峰	周天度 (72)
张培爵	沈庆生 (76)
禹之谟	闻少华 (81)
喻培伦	尚明轩 (85)
林述庆	王学庄 (89)
蔡 锷	张振鹤 (93)
伍廷芳	郑则民 (101)
陈其美	黄德昭 (105)
邓演达	傅洪奎 (111) 周天度
杨虎城	黄德昭 (119)

唐绍仪	郑则民 (126)
胡汉民	周天度 (131)
黄 郛	郑则民 (140)
袁世凯	李宗一 (145)
徐世昌	李宗一 (156)
段祺瑞	李宗一 (162)
曹 錕	张振鹤 (172)
张作霖	黎 光 (179) 孙继武
陆荣廷	李宗一 (190)
李 纯	张振鹤 (198)
徐树铮	李宗一 (204)
孙传芳	张振鹤 (208)
张 勋	李宗一 (215)
梁士诒	郑则民 (221)
陆征祥	郑则民 (227)
曹汝霖	郑则民 (231)
张宗昌	黄德昭 (236)
韩复榘	沈庆生 (243)
石友三	沈庆生 (248)
秦德纯	沈庆生 (253)
张 謇	朱信泉 (259)
徐 润	江绍贞 (266)

穆藕初	朱信泉 (270)
吴蕴初	朱信泉 (274)
荣宗敬、荣德生	江绍贞 (278)
郭 乐	江绍贞 (285)
夏瑞芳	熊尚厚 (291)
宋则久	熊尚厚 (295)
简照南、简玉阶	熊尚厚 (298)
严裕棠	熊尚厚 (304)
杨燊三	熊尚厚 (309)
杜月笙	江绍贞 (314)
康有为	耿云志 (320)
蔡元培	宗志文 (328)
邵飘萍	耿云志 (335)
陶行知	宗志文 (342)
朱自清	娄献阁 (349)
史量才	耿云志 (356)
马相伯	娄献阁 (360)
王国维	耿云志 (366)
丁文江	耿云志 (370)
邹 鲁	闻少华 (377)
刘师培	朱信泉 (382)
罗振玉	耿云志 (387)
江亢虎	曾业英 (391)
田耕莘	雷镇闾 (399)

余日章.....雷镇 闾 (402)

附录：《中华民国人物志》中的《民国人物传》

选录草案(405)

孙 中 山

尚明轩

—

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因此以后又号中山。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出生在广东香山(今中山)县翠亨村。其时中国正处于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他的父亲孙达成,年轻时在澳门当鞋匠,后归家务农。哥哥孙眉,1871年到檀香山作雇工,后经营畜牧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华侨资本家。

孙中山六岁起在家参加农业劳动,十岁进塾读书。他的童年时代,正值太平天国失败不久,听到人们讲述洪、杨革命故事,非常向往。1878年,他随母亲到檀香山,住在哥哥家里,先后进英、美教会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及奥阿厚书院读书,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1883年返回家乡,目睹清吏腐败,深感不满,常加批评。因毁村庙偶像,为豪绅地主所不容,于同年冬往香港。1884年到1885年间,先入拔萃书室、后转域多利书院读书。

1885年,中法战争以清政府向法国侵略者屈服而告终。孙中山忧于民族灾难的深重,产生了从事改造国家的念头。他打算“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①便于1886年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校学医。在这里,他结识了

同学中的会党人物郑士良，以后在革命过程中运动会党起事，得郑助力甚多。第二年秋，他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到 1892 年毕业。在校五年，他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与先后结识的陆皓东、陈少白、杨鹤龄、尤列等人，志趣相同，经常聚谈，倡言革命。其中和陈、杨、尤三人同住香港，交游尤密。当时革命尚未兴起，人们听到他们的革命性言论，都认为是大逆不道，把他们四人称为“四大寇”。

孙中山结束学生生活后，从 1892 年起，先后在澳门、广州开设西医房，借行医为掩护，积极结识一些对清朝统治不满的爱国青年和会党分子，互相议论时政，寻找救国道路，开始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

当时，改良主义思潮正在国内盛行，孙中山及其同志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对统治阶级上层某些人物存有若干幻想。早在 1889 年，他就曾致书已退职的洋务派官僚郑藻如，提出过效法西方国家以进行改良的具体意见，建议先在香山倡行，然后推广全国各地。^② 1894 年 6 月，他又约同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为“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③的变法自强的主张。李鸿章对他的投书没有理睬。

通过事实的教育，孙中山觉悟到上书言事的“和平之法，无可复施”^④，只有用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才能救中国。同年 7 月，中日甲午战起，清政府在战争中接连遭到失败，孙中山更感到国家民族的危机严重，便决定赴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革命。11 月，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经孙中山倡议，在檀岛成立。《兴中会章程》

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进而说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⑤入会者必须宣誓。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⑥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联合同志，于2月21日在中环士丹顿街成立兴中会总部，对外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不久，大家商议袭取广州的计划。其时，清政府刚与日本缔结了《马关条约》，全国人民对于清政府的丧权辱国，无不痛心疾首。于是他们加紧筹备，商定由孙中山率郑士良、陆皓东等入广州主持发动，由杨衢云、黄咏商等留港接应，并决定于当年10月26日（夏历九月初九日）举行起义。经过半年的筹备，广东省各地的会党、绿林和防军，均已联络成功，不料在起义前两日，正当运械赴广州时，事泄失败。陆皓东等被捕遇害。孙中山逃亡日本。这是孙中山武装起义的第一次失败。

孙中山在日本联络华侨，11月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他断发辍，改服装，以示革命决心。之后，再往檀岛。时当新败，不易开展工作，于是在1896年6月又赴美国联络华侨。但当时美洲华侨，风气闭塞，愿赞助革命的不多，与洪门会会员有所接洽，也收效不大，遂决定渡海往英国。10月1日他到达伦敦，首先访问了他学医时的老师英人康德黎（J. Cantlie），并在康寓附近住下来。10月11日，孙中山在外出途中被清

政府驻英公使诱骗绑架，羈囚在使馆里。使馆人员准备把他偷运回国杀害；幸得康德黎等多方设法，积极营救，才于十二天后脱险。此后一年，他留住伦敦，每天到图书馆中努力钻研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等理论书籍，希望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中寻求救国真理。这时期，孙中山由于接触到些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说，加以目睹伦敦的产业工人举行总罢工遭政府军队残酷镇压的情景，感触颇深，从而产生了用民生主义来把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同时解决的初步设想。

孙中山不愿久留欧洲，远离中国，旷废革命时日，遂于1897年秋重到日本并结识了日本朝野的许多人物，其中不少人都对他的革命事业表示同情或赞助。1898年9、10月间，改良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因变法失败，亡命日本。由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居间联络，劝说孙中山等和他们谈判合作。于是，陈少白代表革命党人要他们“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⑦由于康有为坚持“不能忘记‘今上’”的顽固立场，谈判不得结果。^⑧1899年夏秋间，孙中山又与梁启超等在横滨继续就合作问题进行多次会谈，因康有为强烈反对，梁启超口是心非，联合的计划终未实现。此后，孙中山逐渐识破了康有为保皇派的反动面目，并认为他是个“坏透了的孔学家是一文不值的”。^⑨

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京、津一带，清政府于6月对外“宣战”。当时英国政府为镇压中国人民，与沙俄对抗，并“保护”它在长江流域的既得侵略利益，拉拢张之洞、刘坤一等策动“东南互保”；又策动粤督李鸿章据两广“自主”。香港议员英籍华人何启，在港督卜力(Henry A. Blake)授意下，与

陈少白秘商,拟请孙中山帮助李鸿章组织‘独立’政府。李鸿章幕中要人刘学询函邀孙中山来粤‘协同进行’。孙中山得讯后,开始有些犹豫,随后决定:一面仍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一面偕杨衢云、宫崎寅藏等赴广州同李鸿章商谈“合作”。他抵香港后,得知李鸿章尚在观望形势,看风转舵,且有企图诱捕自己的阴谋,便拒绝前往广州,乘原船赴越南再转香港。7月,孙中山仍拟借英国力量推翻清朝,在南方成立‘独立’政府^⑩,来实现他救国的目的。这些活动,表明他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中‘洋务派’的幻想还没有完全破灭。

孙中山在日本于准备再次武装起义的同时,对菲律宾人民的解放事业也给予热情的支持。他早在1898年和菲律宾人民起义军派到日本的代表彭西(Maroano Ponce)有过接触,并应其所请,积极帮助。1899年,他们为他们购买和运送了一批军械,并准备亲率杨衢云等赴菲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1900年1月,他再次设法为他们购置了一批枪械。这种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行动,在旅日的亚洲各国革命人士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同年10月,孙中山又组织了惠州起义。这次起义是郑士良等奉孙中山之命进行的。惠州起义军一度发展到二万多人,血战逾半月,但最后终于失败。

1901年至1904年,孙中山远涉重洋为革命四处奔走:1901年他在日本,1902年冬到越南,1903年秋又从日本往檀香山,1904年春再去美洲,至年底又由美洲到了欧洲。这次所到之处,与从前大不相同,华侨与留学生中同情或赞助革命的人空前地多起来了。因为自《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民

族危机更加严重,清政府威信扫地,人民的不满迅速增长。同时,国内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所增强。不少地方蓬勃地开展抵制美货及收回铁路矿权的运动;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断地掀起抗捐抗税的运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日益倾向革命。国内外各地继兴中会之后,又陆续涌现了一些革命团体。如 1902 年留日学生组织的青年会,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1903 年留日学生成立的拒俄义勇队(后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1904 年湖南组成的华兴会、武昌组成的科学补习所、上海组成的光复会,1905 年上半年湖北创立的日知会等等。与此同时,宣传民族革命和民主思想的各种报刊书籍也纷纷出现,促进着人们的觉醒,推动着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时,中国已处于革命风暴的前夜。

但是,从 1898 年秋流亡在海外的改良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念念不忘他们的‘圣主’,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又于 1899 年 7 月以后,在加拿大等地组织保皇会,反对和破坏革命。同年 12 月,狡猾的梁启超忽然伪装愿与孙中山合作,骗取了孙中山给孙眉等兴中会员的介绍信,持赴檀岛,用‘名为保皇,实则革命’^①的谎言,混淆视听,诱骗华侨加入保皇会。兴中会发源地的檀岛,会员被夺去大半。海外其他各埠兴中会员,也受他们的迷惑,不少转入保皇会,为康、梁所利用。1902 年 2 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停刊后,又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派的政治主张。他惯于在字里行间玩弄些‘革命’的词藻,用来蛊惑群众。这一套骗人伎俩,逐渐地为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所识破。早在 1900 年,孙中山对梁启超上年在檀岛招摇撞骗的无耻行径已给以严厉的

谴责 随后,在孙中山指导下,横滨的革命派半月刊《开智录》、香港的革命派机关报《中国日报》对保皇派一些报刊(如《清议报》、香港《商报》、广州《岭海报》以及后创的《新民丛报》等)上的反动谬论,都进行批驳。两派之间初步进行了理论上的交锋。

1903年10月,孙中山从日本到檀香山,看到檀岛各埠华侨误入保皇会的很多,自己亲手组织成立的兴中会,因梁启超等人的破坏而面目全非,不少老会员都变为保皇会的骨干,痛感保皇会的危害性。认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⑫,决心与保皇派的主张“划清界限,不使混淆”。他一面在檀埠和希炉(Hilo)等地,多次举行大规模的公开演讲,驳斥保皇派的种种谬论。一面改组华侨程蔚南所办商业报纸《檀山新报》为革命喉舌,亲自撰文和保皇会机关报《新中国报》展开笔战。他针对保皇党徒对革命的攻击及《新中国报》主笔陈某发表的《敬告保皇会同志书》一文的谬论,于1903年底和1904年初,先后发表《敬告同乡书》及《驳保皇报》两文。在两文中,孙中山猛烈抨击保皇派的宣传,揭破他们所讲的“爱国”,是爱的虐民媚外的“大清国”,而不是“中华国”,所讲的“革命”是假革命。他们所谓“借(保皇)名以行革命”,全是骗人的。他尖锐地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此外,孙中山还驳斥了他们所谓革命可召瓜分说的可笑,指责他们先行“立宪君主”才能行“立宪民主”说法的荒谬。断言他们没有政治学常识和不懂逻辑,他们是“惑世诬民,遗害非浅”的。这些讲演与文章,有力地揭穿了保皇派的反革命真面目,帮助许多侨胞逐步了解到革命与

保皇的区别，使许多误入保皇会的人重新回到革命派立场上来，在檀岛各埠发生很大的影响。

1904年夏，孙中山离开檀岛到了旧金山。那里是保皇派势力集中之地，华侨中的上层人物多受‘保皇’宣传之骗。孙中山为了使宣传易于生效，先在小商人及工人中进行活动，发表公开演讲，力驳‘保皇’谬说，博得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同情。同时，指派干部改组《大同日报》成为革命派在美洲华侨中的重要喉舌，使该报在与保皇派的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偕同美洲致公堂首领黄三德到美国几十个城市访问，在华侨中间广泛进行革命宣传，肃清保皇派的流毒。

孙中山与保皇派经过激烈的论战，初步打击了各地保皇派的嚣张气焰，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为同盟会的建立进行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05年初，孙中山在比、德、法等国，向中国留学生宣传革命，建立革命组织。7月，他由欧洲再到日本，在东京会晤了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等，针对过去革命团体的分散状态，商议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8月13日，他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作了长篇讲演，再一次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和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⑬并批驳他们污蔑中国人‘愚蠢’的谰言，指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他高度赞扬中国人民的智慧，认为只要敢于革命，就一定能出现大发展的局面。坚决主张从革命着手，在封建皇朝的废墟上建立民主共和国。接着，他和黄、

宋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并联合光复会等反清团体,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同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章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在《章程》中提出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在翌年制订的《军政府宣言》中还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作号召,对同盟会的四条政纲分别作了阐释。)11月26日,《民报》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里,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建立共和国,并且设想通过某些社会经济改良政策,以求避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带来的“祸害”。这是孙中山建立兴中会以来政治思想的巨大发展,也是他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特点,它的提出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件大事。

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继续深入开展和改良派的斗争,他自撰或口授大意由别人执笔成稿而发表的一些文章,进一步抨击改良派的谬论。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旗手,他领导革命派更加广泛地全面开展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以革命派的《民报》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同时有广州、上海、天津、香港以及新加坡、暹罗、旧金山、加拿大等国外各地。双方的二十多种报刊参加了论战。从一九〇五年起论战持续了数年之久。论战的内容,主要环绕着是拥满还是反满?是维护清政府,行君主立宪,还是推倒它,新创民主共和国?是革命会引起瓜分和内乱,还是用革命去消除内乱与瓜分?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是针锋相对的。革命派

认为只有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民主政治,才能把中国从危亡中挽救出来。两派还就是不是可以实行以民生主义为内容的‘社会革命’进行辩驳。改良派认为实行这种革命就会引起“下等社会”的骚动,就会亡国。革命派认为应趁中国大生产事业还没有发达以前,用‘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政策来防止贫富过分悬殊的发生。尽管革命派由于阶级的局限,还有自己理论上的弱点,但他们坚决反对媚外卖国、腐朽透顶的清政府统治,反对君主立宪,是符合人民的利益与要求的。

这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论战,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改良派的政治大搏斗,是革命和反革命、前进和倒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通过这场激烈的论战,暴露了改良派的反动本质,揭穿了他们对革命的歪曲宣传,使许多人摆脱了改良派的影响,转向革命,为辛亥革命作了进一步的思想、舆论准备。

在和改良派论战的同时,孙中山在国内群众反清斗争的推动下,更积极地筹划武装革命。1907至1911年的四年中,他连续组织和领导了八次武装起义。1907年3月,他离日本往越南,在河内设立机关,就近策划粤、桂、滇等省的起义。5月有潮州、黄冈起义,6月有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12月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在镇南关起义中孙中山亲自据守炮台,与清军交战。此役失败后,他被迫离越南,行前又派黄兴、黄明堂分别入广西、云南,因而又有1908年3月的钦州马笃山之役和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孙中山又派人策动了广州新军起义,虽仍归失败,但孙中山毫不气馁,随即召集党人会商于南洋庇能(即檳榔嶼),决心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经过近半年的准备,遂

有1911年4月27日(即夏历三月二十九日)影响最大的黄花岗之役。这些武装起义,由于革命党人主要是在部分新军、会党或防营中进行工作,而没有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因而均归失败。但是这些起义在政治上、精神上给清朝政府以沉重打击,动员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为辛亥武昌起义准备了条件。

在1907到1911年的这一时期内,各地劳动群众由于不堪清政府的剥削和压迫,自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单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抢米’风潮,就有八、九十次之多。革命党人虽然没有自觉地去领导这些群众反抗斗争,但这种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抗斗争,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客观上相互配合,形成了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清朝皇帝的宝座推向火山口上。1911年5月以后,不断扩大的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保路风潮,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当时湖北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曾在清朝的新军中秘密地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湖北约有三分之一的新军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加入了这两个革命组织。在声势浩大的群众保路风潮兴起后,同盟会和文学社、共进会中的革命党人感到革命的时机已趋成熟,便准备利用这种形势发动武装起义。10月9日,起义领导机关遭到破坏。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冲出营房,经过一夜激战占领了武昌城,两三天内先后占领汉阳、汉口,革命在武汉首先取得了胜利。接着,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小团体,立即在各省领导和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到11月下旬,全国二

十四个省区中已有十四省宣布独立，其他各省区也正在进行反清斗争。清政府的反动统治，顿时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当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活动。他得知武昌起义胜利消息后，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办理外交交涉，断绝清朝政府的后援。因此，便由美赴英，再到法国奔走活动；于 11 月下旬才动身归国， 12 月 25 日，到达上海。29 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筹组中央临时政府，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由上海到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改用公历，以这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孙中山领导人民多年奋斗的结果。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随同清朝政府的垮台，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最后结束。孙中山在以后的短短三个月内，颁布了三十多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并在 3 月 11 日公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使后来任何帝制复辟都只能是短命的丑剧。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对孙中山及其革命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扬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⑭。

但是，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处于极不巩固的地位。一方面投机革命的立宪党人、官僚、政客钻进了这个政权的内部进行破坏；另一方面清政府起用了大野心家袁世凯来绞杀革命。袁世凯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党人不能广泛地发动人民，打退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结果就被内外反动势力所包围，通过所谓

“南北和议”，革命党人被迫向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妥协了。根据协议，1912年2月13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也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荐袁以自代，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所篡窃了。虽然孙中山在正式解除职务（4月1日）之前，还尽力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须到南京就职和必须遵守《临时约法》等三条防范袁世凯背叛共和国的办法，但也无济于事。最后连中央临时政府设置地点，也迁就袁世凯，从南京搬到北京去了。

孙中山辞职后，起初还总是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他于8月24日应邀到达北京与袁会商内政纲领时，为表示真诚合作，声明辞去正式大总统候选人，请袁于十年内练精兵百万，自己则以在野的身分，专力从事社会实业活动；9月，接受袁政府的任命，担任全国铁路督办，满怀着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愿望，回到上海。1913年2月，他去日本考察铁路状况并积极进行借款活动。同年7月初，在上海与英国宝林公司签订广州至重庆铁路借款合同。这些情况表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反动本性逐渐丧失了警惕。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杀，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桩震动国内外的政治事件。原来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成了个议会迷，醉心于责任内阁制，到处奔走宣传。为争取国会中的优势，他于1912年8月，拉拢由官僚政客组成的四个小政党，与同盟会合组为国民党。国民党仍拥孙中山为理事长，但宋教仁已成为党的核心人物，同时党也丧失了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变成一个庞杂的政治团体。宋教仁想以内阁来